

国别与区域研究视野下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

汪 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 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 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跨国流动的重要篇章, 也是考察日本“对华认知”与东亚知识生产格局的关键窗口。本文在综合既有鲁迅域外传播史与日本鲁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强调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多学科方法, 重新审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路径、在地化阐释与当代社会接受。文章首先梳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鲁迅日译的阶段特征, 其次分析“竹内鲁迅”“左翼鲁迅”等关键范式如何塑造日本的鲁迅形象, 再从教育制度和公共文化空间考察鲁迅在日本社会的日常化存在, 并结合新的区域研究视角讨论日本鲁迅研究的知识地理与方法转向, 最后指出这一跨国接受史对于反思中国形象建构和重写世界鲁迅史的启示。

关键词: 鲁迅; 日本; 译介与接受; 国别与区域研究; 跨文化阐释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诸多个案中, 鲁迅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联尤为突出。一方面, 日本是最早系统译介鲁迅作品、也是率先编印《鲁迅全集》的国家之一, 鲁迅日文译本数量之多、版本形态之复杂, 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译本既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杂文, 也涉及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多种文类, 呈现出“全集—选集—单篇集”并行的立体结构。另一方面, 日本学界围绕鲁迅形成了持续百年的研究共同体, 从战前的思想启蒙话语, 到战后的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 再到当代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再阐释, 其内部的知识谱系呈现出高度的层累性与多样性。然而, 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往往被理解为“他者文化输入”的单向过程, 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兴起为重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1 日本鲁迅译介的阶段性格局与区域语境

从时间上看, 日本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大致可分为若干阶段。二十年代萌动期的译介, 多依托旅华日本人创办的刊物及在华出版机构, 一些在中国的日本记者、留学生和传教士成为最早的译者。他们在处理文本时往往更关注思想内容, 而相对忽略文体层面的实验性, 这与当时日本知识界急于从中国新文学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心态密切相关^[1]。三十年代以后, 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鲁迅在日本出版的译本数量反而有所增加, 出现了由不同出版社面向不同读者群的多个对译版本。译者之间围绕“直译/意译”、

白话色彩的保留与否、方言与口语如何在日语中再现等问题展开实践探索, 有的倾向于把鲁迅塑造成“落后封建中国”的控诉者, 有的则更强调其作为“普遍人性批判者”的一面^[3]。

战争期间, 鲁迅在日本的译介明显放缓, 但并未完全中断。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严密的审查体系中, 仍将鲁迅视为批判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重要思想资源, 采取小册子、内部读物等形式维持对鲁迅的阅读。战后, 日本在盟军占领和社会重建的复杂局势中重新发现鲁迅, 其作品中的“自我启蒙”“国民反省”主题与战后知识界的自我批评情绪产生共振, 因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迎来译介与研究的高涨期^[2]。这一时期, 日本出版界陆续推出多种版本的鲁迅全集、精选集和廉价文库本。统计显示, 战后数十年间日本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与论文数量, 远超同时期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总和, 鲁迅由此成为日本中国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核心作者”之一^[2]。

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冷战格局解体和东亚区域化进程的推进, 鲁迅在日本的译介进入相对稳定期。一方面, 经典篇目的重译仍然持续, 译者在文体再现、注释系统和跨文本比较上不断提出新的方案; 另一方面, 研究重心开始从作品解读转向接受史、教材编写、文化记忆等议题, 鲁迅逐渐成为日本中国学与区域研究中难以绕开的标志性人物^[1]。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 随着东亚区域研究和跨国文学研究的兴起, 一批年轻学者开始把日本鲁迅研究与韩国、欧美的鲁迅接受史进行比较, 试图描绘“世界鲁迅”的多

重地图，日本的鲁迅译介史由此获得新的意义坐标。

2 “竹内鲁迅”“左翼鲁迅”与在地化鲁迅形象的生成

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竹内鲁迅”几乎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竹内好既是重要的鲁迅译者，也是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重要理论家。他在鲁迅形象的塑造上强调“作为亚洲一员的鲁迅”，主张从“反抗的主体”而非“现实主义作家”的角度理解鲁迅，将其置入东亚近代化与民族解放的广阔背景之中^[5]。在竹内的叙述中，鲁迅的意义并不限于中国内部的启蒙与革命，而在于他如何代表一种来自“亚细亚内部”的精神抗争力量，能够与日本国内的战后自我批判与亚洲主义思潮产生共鸣。

与“竹内鲁迅”并行的，是以鹿地亘为代表的“左翼鲁迅”形象。鹿地在战前即因反战活动遭到镇压，战后他笔下的鲁迅被塑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世界革命阵营”的一员。相关论著往往把鲁迅与日本国内的劳工运动、学生运动并置，强调其作品在突破民族主义视野、联结“被压迫者共同体”方面的意义^[2]。此时，鲁迅不再仅仅是中国民族启蒙者，而是与世界各地革命文学传统合流的“战斗文人”。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以藤井省三为代表的学者，在细致考证译本与版本流传的基础上，强调以文献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重审鲁迅，既注意鲁迅文本的语言细部，又关注其在日文世界中的再生产机制。藤井对《阿Q正传》等作品的新译本，有意识地修正早期译本中过度口语化、断句粗糙等问题，努力在日语中重现鲁迅句式的曲折感与语气的模糊性，从而让日本读者更贴近原作的审美张力^[1]。

“竹内鲁迅”“左翼鲁迅”“文献学鲁迅”等不同范式构成了日本知识界对鲁迅的多层想象。它们既与日本自身的政治氛围、学术潮流和世代经验紧密相连，又不断被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所回应，形成跨国学术场域中的互动回路^[2]。这种互动表明，“日本的鲁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持续的跨国对话中被不断改写与再定位。

3 教育体系与公共空间中的鲁迅

如果仅从学术论文和专著的角度观察鲁迅在日本的接受，容易忽略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日常化”存在。事实上，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鲁迅作品陆续被收入日本中学、高中乃至大学的国语与世界文学教材，《故乡》《孔乙己》等篇章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反复出现，使几代日本读者

在校园教育阶段便与鲁迅相遇^[3]。教材编写者在选篇和注释上的抉择，往往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对于中国与“近代化经验”的基本判断。例如，一些战后初期的教材强调鲁迅对封建乡村结构的批判，将中国乡土社会的“麻木”“冷漠”与日本战前军国主义下的集体主义压力相对照，借此引导学生反思盲目服从与集体暴力；而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材更倾向于突出鲁迅文本中人物的“孤独”“自我分裂”，把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强调战后个体化社会中普遍弥漫的“无根感”“异化感”。

除了课堂之外，日本出版市场上长期存在面向普通读者的鲁迅选集、入门读物与漫画化改写版本。一些出版社在纪念鲁迅诞辰、逝世周年或日中邦交正常化纪念年推出特别企划，将鲁迅置于“亚洲作家”“反战作家”“世界名著”多重书系之中，使其能够在不同兴趣取向的读者圈层中流动^[3]。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还以鲁迅为纽带，举办中日交流活动、读书会与文学散步路线设计，例如以鲁迅相关译者故居、出版社旧址为节点的“鲁迅文学漫步”，将鲁迅纳入地方文化品牌与城市记忆的建构中。这种社会接受的日常化过程，意味着鲁迅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是嵌入日本社会自我认知与对外关系叙事中的一环。日本读者通过鲁迅理解中国的乡土、革命与现代性，同时也与鲁迅人物的对照中反思自身的社会矛盾与结构性问题。

4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别与区域研究内部方法论反思的展开，日本鲁迅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意识。首先，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鲁迅译本在日本的“知识地理”，哪些译者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他们背后的大学机构、出版社与思想圈层如何彼此关联；地方高校、地方出版社参与鲁迅译介的路径又有何差异^[1]。通过对译本出版地、发行渠道和读者反馈的梳理，可以更细致地呈现鲁迅在日本不同社会阶层与区域空间中的传播轨迹。其次，跨国比较视野日益受到重视。一些研究者将日本的鲁迅译介与韩国、台湾乃至欧美的鲁迅接受放在同一框架下考察，比较不同语境中对鲁迅“国民性批判”“启蒙—反启蒙张力”“革命想象”等主题的阐释差异，从而揭示各自国别与区域研究传统背后不同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关怀^[2]。在此意义上，“日本的鲁迅”不再是孤立案例，而成为“世界鲁迅”多重图像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再次，数字人文方法开始被引入鲁迅在日本的接受研究。一些团队尝试利用数据库技术整理鲁迅相关译本、期刊论文和报刊评论，对标题、关键词、主题词的时序变化进行量化分析，从中发现某些概念（如“国民性”“启蒙”“革命”“亚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热度变化，并进一步追踪它们与日本国内政治事件、中日外交关系起伏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路径，为传统以文本细读为主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总体而言，国别与区域研究视角下的日本鲁迅研究，正逐渐从“作家研究”转向“知识网络研究”。研究者不再只关心“日本如何理解鲁迅”，而是进一步追问为何在特定时期会形成某种“鲁迅像”，哪些机构与个人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形象的生成与流通，这一形象又如何参与重塑日本对中国、对东亚乃至对自身的理解。这些追问使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史，得以与更广阔的区域政治与知识史体系发生深度关联。

5 从“日本的鲁迅”到“世界的鲁迅”

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置于国别与区域研究框架下，可以得到至少三点启示。其一，译介史本身就是区域政治与文化力量关系的缩影。日本在不同阶段对鲁迅的重读，往往与其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对自身现代性经验的反思密切相连。正因此，研究鲁迅在日本的译介史，需要超越纯粹的作者研究或文本研究，将之与东亚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博弈以及民间交流史结合起来考察。其二，日本内部形成的多种“鲁迅像”，不断通过学术翻译、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的方式，被反馈到中国及其他国家，对“世界鲁迅史”的书写产生反向影响。从中国学界对竹内好等人的批评与吸收，到近年来对日本鲁迅研究史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到一个跨国对话的循环结构。日本的鲁迅研究既深受中国议题的牵引，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国学界理解自身经典作家的方式。其三，在全球化与区域重组的当下，鲁迅在日本的接受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国民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路径。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再创造，

显示出一部本属于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如何在他者语境中被赋予关于战争记忆、战后民主、冷战政治与当代少数者经验等多重意义。对这一过程的细致描写，有助于我们超越以单一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文学史书写，将鲁迅视为在东亚与世界范围内持续生成的“跨区域文本”^[1]。

6 结语

总的来看，日本对鲁迅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是一个在特定区域结构中展开的长期历史进程。它既受制于中日关系的冷暖变化，也深受日本国内政治、思想与学术环境的影响；既包含出版数量、版本形态等可量化的层面，也涉及“竹内鲁迅”“左翼鲁迅”等难以简单归类的形象生产。将这一复杂历程纳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鲁迅“走向世界”路径的认知，更促使研究者反思自身所处的知识位置，我们如何在多重区域视角的交叉中讲述鲁迅故事，如何在避免简单“他者化”与单向度“民族化”的前提下，重新建构一个开放的世界鲁迅研究格局。

参考文献：

- [1] 沈俊,林敏洁.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J].文学研究,2017(2):42-50.
- [2] 熊辉.鲁迅作品在日本翻译与接受研究综述[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2(1):1-6.
- [3] 罗琬莹,石新卉.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研究[J].学教育,2021(12):108-109.
- [4] 蒋永国.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译介的肇始——“文学革命”的视野[J].当代文坛,2018(4):95-103.
- [5] 陈朝辉.论“竹内鲁迅”的生成[J].外国文学研究,2015(3):80-88.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2022031。）